

流动时代农村青年“留守宝妈”的情感困境与观照理路

胡德庆

(东南大学 马克思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摘要 当前关于农村青年和青年女性情感问题的研究,鲜有触及流动时代下最需情感观照的农村青年“留守宝妈”群体。在马克思青年观与杜威情感理论观照下,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发现,流动时代下,“重要他人”频繁化时空性流动促使“宝妈”情感劳动量持续增加,新旧文化价值理念间动态化冲突促使“宝妈”日常情感输入消极化,数字化负向信息多模态传播与渗透促使“宝妈”时常陷入情绪焦虑,乡村社会转型中交往实践场域与情感内容无序之变促使“宝妈”情感需求难以合理满足。健康情感具有积极的内在感染性、精神渗透性、群体交互性、实践扩展性,可在多维度与高强度的流动情境中维护“宝妈”心理健康、增强“宝妈”育儿信念、促进“宝妈”协同进步,以及缓和乡村社会人际矛盾冲突。据此建议从升级基层情感管理方式、创造和谐人际沟通情境、强化群团组织服务力、优化相关制度机制与提升自我情感观照能力等方面,助力流动时代农村青年“留守宝妈”化解情感困境、塑造健康情感世界。

关键词 流动时代;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情感生活;留守妇女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5)04-0166-12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xb.2025.04.015

永无止境的时间、极速革新的技术、持续降低的异地成本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正驱动大量农村青年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其中会有新晋青年宝妈迫于抚养子女与养老敬老压力而选择留守农村,成为“留守宝妈”。妇女儿童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推进强国建设,妇女是重要力量,儿童是未来主力军^[1]。中国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农村青年“留守宝妈”合理参与、积极奉献。因而,要补齐农村社会福利短板,加强对农村“三留守”人员的关心关爱^[2]。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本身正处于社会情感待自主赋权、价值观待合理塑造、强烈渴望精神观照的发展阶段,但却又在农村独自抚养一个甚至多个需要个人情感全面投入的孩子,更需要对其情感发展予以有效关注和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制度开放式优化及交通工具、通信技术急速革新,阻碍社会流动的藩篱逐渐被打破,人们日益告别地域性封闭状态,一个高度流动化的中国逐渐形成,其中大规模人口流动是其核心指向,因而其也被一些学者称为“迁徙中国形态”^[3]。本文所提的“流动”具有更加广义的指向,涵盖着由新技术、新市场、新观念等带来的一切与人口发展相关事物的流动性状态,既包括人口本身的高速流动,也包括物质性商品、精神性文化资源及个体社会阶层、岗位等,在现实社会中高速化“交换”与流动的形态。高速且庞大的人口流、信息流、技术流等,不仅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强劲活力,也持续推动国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转向。而其对推动中国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14~35周岁)影响最大,特别是情感生活层面。据统计,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达3.76亿,约占全国总人口26.04%^[4]。其中15~30岁流量流动人口比例相对更

收稿日期:2024-06-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兴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政治倾向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新兴青年群体的社会整合”(21@ZH025)。

高^[5]。流动化且具有极高情感需求的青年,不停地在城乡之间、城城之间及不同行业和部门之间流动。尤其是夹在“回不去的故乡”和“留不下的远方”及“留在故乡”和“心在远方”之间的青年农民工及其家属(所在小家庭已成为“流动家庭”),他们在社会流动化中奉献度极高,但同时也经常面临各类情感困境。

面对流动化的社会性生存,部分新晋农村青年父母在面临“流动”和“留守”的两难抉择时,考虑到现实生活压力和为了不让孩子成为“孤独”的留守儿童,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人外出“流动”,另一人在家“留守”——被动选择“半工半耕”的家计分工模式。而在权衡个人经济收入能力、同孩子天然亲密感及人身安全后,女方一般情况下是最适合居家留守、成为“留守宝妈”的一方。这里提到的“留守宝妈”,就是指留在农村老家照顾孩子的青年女性。男重智,女重情。作为留守在家充当儿媳、母亲、妻子及劳动力的宝妈,其个人身份特殊性,决定了其情感特殊性。她们情感的社会化、劳动化、“无我化”,较其他青年女性群体程度更强,也更为具体和深刻。加之农村青年“留守宝妈”内在世界极立体——既具有青年的激情与活力、女性的细腻与敏锐、母亲的质朴与善良;也具有青年的情感经验缺乏、女性的对待负面事物易敏感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境高压化。这样的现实特征与流动时代带来的现实情境相碰撞,必然会使其实内情感世界出现极大变化。

青年女性情感问题一直为当前学界所重视,并从不同视角对此展开研究。第一,从理论知识视角,探讨青年女性情感相关概念、特征与价值维度。情感作为人社会性存在的重要方式和标志^[6],是一种以自我体验形式反映主客体需要关系的心理现象^[7],带有历史制约性。情感能力则是主体以情感、情绪为操作对象所表现出的一种本领^[8],对人价值实现具有触发、驱动和保证作用。其中社会情感能力在人青年期受影响更大^[9]。第二,从情感劳动视角,探讨当代青年女性可能存在的“情感异化”问题。情感劳动具有性别模式^[10]。情感劳动的付出体现了青年女性劳动者生物性情感向社会性情感的转化,从而使其私人情感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11]。性别期望常使女性在情感劳动中更多地压抑消极情绪而展示积极情绪,因而“情感劳动作为劳动性别分工新形式,可理解为造成青年女性情感异化的再生新机制”^[10]。第三,从青年发展视角,探讨助力青年女性情感生活高质量化的实践路径。人际改善说认为,流动导致熟人情感疏离,应明确青年女性社交心理边界,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构其主体间性,实现真诚情感互动^[12]。增权赋能说指出,可通过制度优化、组织建设、平台搭建等,为青年女性情感发展增权赋能^[13]。教育提升说强调,通过情感教育,可使受教育者觉悟情感生活普遍性、抛弃情感生活狭隘性,自觉净化情绪杂质,提高情感和谐度^[14]。

总体上看,当前学界相关性研究成果较丰富,为深入探究青年女性情感问题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参照。但从具体内容看,当前研究仍存有可拓展的现实空间,对青年女性中特殊群体情感问题聚焦不够,观照社会流动现实、关注农村基层的可操作性成果缺乏。在关注农村“留守青年”、返乡青年情感问题的主题文献中,有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乡村发展与青年情感发展的现实关系(如青年情感嵌入与乡村社会治理^[15]),以及“留守青年”在乡村现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系列情感问题,如乡村社会转型中农村青年婚恋、家庭关系维护与构建问题^[16]、乡土文化情感认同问题及媒介化圈层社交与人际情感主体性问题^[17]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应对策略。但对社会流动的现实性及其对农村青年女性情感生活带来的特殊影响关注不够,鲜有触及亟需情感观照的农村青年“留守宝妈”这一特殊群体。流动时代青年“留守宝妈”具体面临哪些情感困境?其情感健康发展有怎样的现实价值?如何助力化解其当下存在的情感困境?这些问题既关涉当代青年女性精神世界协同塑造,也关系农村现代化发展实践,更影响我国儿童事业全面推进,需要学界系统回应。

一、理论基础、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1. 理论基础:马克思青年观与杜威情感理论

马克思青年观科学揭示了青年精神世界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认为,青年始终充满包括精神需要在内的各种需要,热衷于新鲜事物,在社会发展中始终充当最具活力的先锋力量,但其也存

有一定精神缺陷和实践局限,如社会实践经验不足、易受影响和鼓动等,这又决定了青年需要在正确引导和组织下发挥先锋性,成为各领域干事创业主力军。他曾指出,“他们的性格在受临时政府征募的青年时期是极易受人影响的”,能够做出英雄业绩,也能做出低劣行为^[18]。青年人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快,是引领风气之先的力量,但同时他们社会阅历相对较少,且对社会发展感知很敏锐,较容易受到外界和错误东西影响^[19]。这些观点启示着:在社会交往尤其是精神交往中既要看到青年先进性,也应合理观照青年“被动性”,有效引导他们在加速流动社会中有序交往。

杜威情感理论系统揭示了情感于人与特定情境交互作用中形成、变化和发展的现实过程,为理解现代社会情感问题提供了重要框架。作为人类特有的情感,需要满足“有明确对象”“指向对象态度”和“行为伴随”这三个基本条件——特殊“行为模式+感知模式”的综合,不存在抽象、独立的情感^[20]。在情感产生发展上,杜威认为,人的情感来自社会实践、同行为一体协作,受特定情境所影响,但它经过人的理智化加工,又超越着原社会实践及其经验。他明确指出,“所有情感都是活动伴随物”^[21]“是由情境所暗示”^[22]。在情感价值层面,杜威认为,人的情感包含可反思空间,“是运动和黏合的力量”^[22],具有强大感染力、渗透性和扩展性,可影响个人与环境(生命和情境)的“交互整体”迈向更和谐的新阶段^[23]。和理智回应(基于逻辑分析、概念化思维的回应方式)的非整全属性(理性思考往往把事物拆解成抽象的概念或逻辑片段)相比,“情感性回应是整全回应,而它产生的结果也会更弥散、持久”^[24]。杜威十分看重情感与情境间的现实关系,认为情感与其面对的蕴含众多未知可能性的情境(具体的、历史的“事”的“集合”)联系紧密——情感于情境中酝酿和激发^[22]。概言之,杜威基于对现代社会人境况的担忧和对西方传统情感理论的批判而构建的具有自身特殊体系的情感理论,为在流动时代(当代社会特殊情境)下系统探讨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情感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

2. 分析框架

科学回应流动时代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情感问题,须围绕“青年宝妈”重点把握“流动情境”与“情感”的相互作用关系。因而,皆关注人(青年)精神世界发展的马克思青年观和杜威情感理论,为探究流动时代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情感困境、情感价值及新的情感生活构建路径,提供了科学工具。马克思青年观提供了系统认识流动时代下青年精神交往普遍规律(如先锋性与被动性共存)的理论工具,而杜威情感理论则有重点地系统阐释了“特殊情境”(对应流动时代)与人的情感现实关系问题,二者恰如“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这两类科学理论综合指导下,结合农村青年“留守宝妈”特殊生产生活情境,按照“流动—青年宝妈—情感”这一线索,可构建“情境—流动因素—特殊情境—青年宝妈—交互作用关系—情感活动变化”为主要脉络的理论分析框架(图1),以求系统全面地呈现“留守宝妈”情感困境与情感价值,并提出合理化解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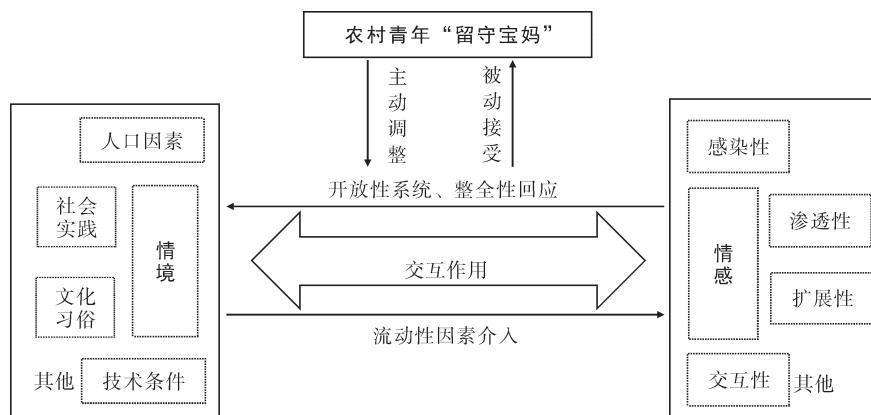


图1 流动时代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情感问题分析框架

3. 研究方法

为更深入全面地对流动时代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情感问题进行分析,本研究在马克思青年观和

杜威情感理论观照下,采用“线上+线下”结合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进行质性研究。线下调研地为安徽省六安市S镇(笔者为该镇团委兼职副书记),该镇位于大别山和江淮平原之间,人口约3.5万人,流动人口较多,许多年轻人前往合肥、上海、南京、无锡等地务工。在半结构化访谈上,采用目的性抽样,在S镇选取15名典型的“留守宝妈”作为访谈对象(CBH-31-01至WQY-33-15,表1)。访谈内容主要涉及成为“留守宝妈”后生活上的变化、思想上的困惑、情感上的感受、组织上的关怀、令其难忘和委屈的事、释放精神压力的方式等多个方面。为保证访谈内容可靠性和全面性,访谈结束后,笔者也及时指导两位好友通过日常交流的方式与部分被访谈者(存在交集,私人感情较好)进行私下交流,从侧面再尽可能多地了解她们内心真实想法。除深度访谈外,笔者也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自身兼任的镇团委副书记身份,借助各种机会、平台对各类“留守宝妈”情感活动进行观察,以求科学厘清各问题本质属性和它们之间逻辑关系,合理搭建理论与现实、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桥梁,系统回应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情感层面现实关切。

表1 被访谈对象基本信息汇总

编号	年龄	学历	“留守”时长/ 孩子年龄	丈夫年均回 家次数	“留守”前后情感/情绪有无变化 (摘录性描述)	易引起个人情感波动 的关键词
CBH-31-01	31	大专	72个月/6岁、2岁	2	有,“会经常对家人发脾气,心里经常 ‘窝着火’”	教育、钱、婆媳
CL-27-02	27	高中	50个月/4岁	1	有,“时常心情郁闷”	教育、杂事多
YD-29-03	29	本科	41个月/3岁	2~5	有,“感到比以前更累,对很多事会眼不 见、心不烦”	孩子、钱、亲戚
FYQ-32-04	32	中专	60个月/7岁、2岁	3	有,“常感到力不从心,无力感、疲惫感 增多”	家庭、人际交往、 教育、钱
HW-26-05	26	初中	30个月/2岁	1	有,“好像有点抑郁,经常晚上睡不着”	孩子、钱、丈夫
JFF-24-06	24	高中	28个月/2岁	2	有,“虽有了孩子,但总开心不起来,觉 得很烦躁”	孩子、健康、钱
XCJ-33-07	33	中专	90个月/8岁、5岁	1~3	有,“天天在家待着,啥也干不了,为孩 子和钱发愁”	钱、教育、房子
ZJJ-27-08	27	本科	40个月/3岁	2	有,“在婆家挺孤独的,只能通过视频说 点心里话”	孩子、亲人
LW-25-09	25	高中	50个月/4岁	2~3	有,“斗嘴、生气已成为家常便饭”	钱、孩子、婆家人
CQ-23-10	23	高中	15个月/1岁	2	有,“一直和公婆待在一起,真的很不习 惯”	孩子、钱、房子、 人情往来
WLJ-30-11	30	初中	80个月/7岁	3	有,“有孩子后才知当妈难,当没钱、没 文化的妈更难”	孩子、教育、钱
XXL-29-12	29	大专	60个月/5岁、1岁	2~4	有,“心天天放孩子身上,其他事啥也顾 不了”	孩子、健康、 教育
YHC-34-13	34	高中	超100个月/ 11岁、5岁	3	有,“为小孩学习、为家庭负担发愁”	孩子、生活压力
ZM-25-14	27	高中	70个月/6岁	2	有,“有孩子就没自由了”	教育、社交、钱
WQY-33-15	33	初中	超100个月/10岁、 4岁	1~3	有,“天天和孩子吵、和公婆生闷气,他 (丈夫)有时也不能理解”	孩子、婆媳、钱、 人情世故

二、流动时代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情感生活透视

情感与情境相交互,情境中交互作用的各类“物”都会对情感产生塑造或扭曲作用。“女性天生是情感动物”,她们情感社会性较男性表现得更强烈和深刻,感染性也更突出。进入流动时代,包括人、价值观念等在内的各种“物”的极速化流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情感敏感度相对较高的青年女性原本正常化的情感生活,特别是对在乡村家庭再生产场景和分工格局中处于特殊位置的青年“留守宝妈”来说——独自肩负“养”与“孝”的双重责任、身处农村基层、活动圈子相对较窄、面临高体力与高脑力劳动双重压力,这种流动性情境使得她们内在情感处于张力状态,迫切需要特殊关照。

1.“重要他人”频繁化的时空性流动促使“宝妈”情感劳动量持续增加

“重要他人”作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重要范畴,是指对个体身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现实人。杜威情感理论视域下,人的情感具有对象性、情境性和交互性,人需要通过情感展演来维护和发展与之相联系的对象的人际关系。农村青年“留守宝妈”,也属于服务性“劳动者”——为家庭正常再生产服务,由此决定情感劳动是其劳动的重要方面。情感劳动指劳动者在服务中所付出的私人情感——“进行情感管理,压抑或伪装情感,形成交往对象可观察到的面部表情或身体语言,以影响交往对象感受”^[25]。基于情感劳动的控制属性,有研究者提出,过度情感劳动会使主体出现自我疏离、自我异化及倦怠情绪^[26]。而这种现实性危害,正在流动时代下的农村青年“留守宝妈”群体中频繁出现与演化。

农村是人情度极高的特殊社会,其人际交往中更多的是熟人间的情感交流。流动时代下,丈夫、好友、娘家亲人等这一核心层互动性“重要他人”的流动性抽离,面对需要悉心照顾的孩子和具有不同性格特点的婆家亲戚及其他陌生人(乡村在现代转型中逐渐步入“陌生人社会”^[27])频繁到访,“留守宝妈”需要持续高压化地投入与输出情感——一个人抚养孩子、逗孩子开心;面对婆家亲戚、期待亲戚们认可;应付邻里事务、拓展村里熟人交往,有些宝妈还要“代夫养老”、做繁重家务、农活等。这一系列缺少“重要他人”参与的“独自面对”,无疑会使其情感劳动量倍增——时空上变相扩展、压力上持续增大,进而致其不停压缩、消耗私人情感,直至产生不同程度的情感懈怠或情感障碍问题,影响自身生活质量。ZJJ-27-08在访谈中说:“平时老公上班很忙,只能晚上打视频聊会天,现在有心事呢,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时和他说,他也帮不上忙。闺蜜们也都挺忙,和婆家人就更没什么可聊了。爸妈他们一年也最多来两次。更多时候就在孩子身上找安慰吧。”FYQ-32-04谈道:“自己当妈才知道养孩子多不容易。不仅要供他们吃喝、注意他们健康,还要照顾他们情绪。现在的小孩都是‘祖宗’,打不得、骂不得,真要打了,孩子的爷奶也会冲我发脾气。现在整个家就我地位低,谁的情绪都要照顾到。”YD-29-03也说道:“孩子不好带、农活不好干、一些婆家亲戚也不太好相处,感觉身心俱疲,还是在外打工日子舒服。”

2. 新旧文化价值理念间的动态化冲突促使“宝妈”日常情感输入消极化

人际交往不仅是个体构建现实性社会关系的必然过程,更是积累、交换和共享价值理念的具身体验。情感既属于心理范畴,也是文化与历史范畴,其会在文化交流中展开、在社会经验与体验中转化。新旧文化价值理念间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价值观层面,对人际情感演化具有直接性影响。而“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28],始终同人的情感情绪体验相“纠缠”。即,个体情感实践总会受到蕴含一定文化价值理念的周边语境的影响。交往对象以言语为中介的态度反映、价值理念表达、习俗习惯传递,更是直接且深刻地影响着主体情感体验,使其内在情感样态发生刺激性变化。

流动性可塑造主体身心发展新特征。相较于其他群体,青年始终是流动时代下新事物、新理念等的快速接受者,并热衷于在其参与下进行生产生活实践。于青年“留守宝妈”而言,由于其在留守前大都生活在城市,习得了同农村其他群体尤其是老年人不一样的育儿理念和生活习惯。这易使得她们同村里“原有留守人”在生活习惯、话语方式及育儿理念等方面产生分歧,进而引发人际冲突,产生负向心理感受。例如,一些见不惯新妈妈育儿方式的农村老人,如用奶粉喂养、给小孩穿尿不湿等,会经常以“嚼耳根”“调侃”等方式“说道”,这无疑会通过情感互动,为“留守宝妈”情感生活带来一定压力。概言之,社会流动性带来的新旧文化价值理念间的动态化冲突,会时常在亲人的不理解、周围人的看不惯等情境中,扭曲或抑制一些“留守宝妈”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出于减少情感冲突目的,时常将自己原本丰富的情感圈禁在内心“小房间”,不停地在精神世界积压交往对象传导的负向情感。两个孩子的宝妈WQY-33-15在访谈中说:“自从怀上孩子回到婆家这边,小矛盾就不断,经常被村里一些老人气哭。生养孩子、该怎么生活是我自己的事,他们凭啥指指点点。现在都习惯了,能忍就忍,有时装着听不到那些牢骚话也就过去了,真不想‘掐架’。”HW-26-05也提到:“真的很烦那些老是对我说道的人,时代变了,但他们老观念就是不变,天天听他们的‘老传统’真心累。”

3. 数字化负向信息的多模态传播与渗透促使“宝妈”时常陷入情绪焦虑

数智技术深度改变人们交互时空间度,使乡村生产生活社会图景逐渐转向“实一虚”共在。无论是限于具体交往情境而被中断的个人情感,还是无从知晓的民间情绪,都可借助由数智技术支撑的数字媒介,提升传播力与互动性^[29]。杜威认为,“情感可理解为一种感知模式”^[22],在可感知情境中发生转化。流动时代里,各类社会信息会在数智技术驱动下实现加速度、渗透式流动(数字媒介积极寻求影响受众心理过程来获取理想传播效果^[30]),使社会教育焦虑、阶层焦虑、买房焦虑等,时刻以文图、短视频、直播等形式环绕在本就对社会信息易敏感的青年宝妈身边,营造出一种焦虑化特殊情境。加之农村青年“留守宝妈”一直居家带娃,习惯于通过数智平台了解外面世界,同时又总喜欢进行现状对比,这无疑会使各类焦虑性信息在其情感世界塑造中变得渗透性更强,致其时常陷入焦虑境遇。

具言之,数字化信息高强度流动,正使“外面世界”的教育内卷、家庭矛盾、对女性的不公正对待等,全天候环绕在对数智平台有一定程度依赖的农村青年“留守宝妈”身边,共同加剧其情感焦虑层面“跨时空化”危机——紧张氛围、焦虑情绪从非周围领域跨越至日常生活的每个时空角落,继而与其生产生活中其他情感问题相叠加,挤压和吞噬她们正常精神生活空间。除此之外,受全天候抚养孩子的限制,青年“留守宝妈”自由活动空间缩小、娱乐时间缩短,也在促使她们情感上的焦虑在时空上相对延长、扩大(情感本就具有空间依赖性^[27])。“确实每天都很焦虑,养孩子要花钱,还要考虑买房,老张(受访者丈夫)的身体也有点小毛病。一看到朋友圈里的好友都混得那么好,还有刷视频时看到没钱的难处,再看看没钱、没文化的自己,就觉得活得挺没意思,不如人啊。”(WLJ—30—11)数字化流动带来的叠加化“时空焦虑”,使青年“留守宝妈”难以自由安放内生情感、实现情感和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宇宙,情感层面的叠加化“时空焦虑”对其威胁性极大。若对此长时间漠视,必然会导致精神宇宙运动失序,制约个体主体性,出现情绪性行为偏差。“失眠、掉发对我来说已成寻常事,没办法,真愁啊,现在的社会都在‘向钱看’,而他(丈夫)一人在外挣钱全家花,什么时候咱家才能混好呢。”(YHC—34—13)

4. 乡村交往实践场域与情感内容无序之变促使“宝妈”情感需求难以合理满足

个体身处的交往场域、情感内容状况与其情感满足状态存在正相关性,这也是情感情境性与交互性的重要体现。在现代化流动性力量冲击下,我国乡村生产生活时空场域与内在关系结构正处于剧烈变迁中,乡村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社会交往关系等正发生解构与重构,倾向于理性化、松散化(原本紧密联系的乡村共同体日益变得松散^[31])。这同时引起乡村社会性情感内容的变化,如道德感、亲情感、美感等。作为一个具有弥散性、扩展性的质性整体^[23],个人情感演进离不开特定场域支撑与合理的社会性互动,其本身就是社会性“观念和感觉相互协作的行动”^[20]。青年期是个人情感强波动期,这一时期人的情感丰富但稳定性欠佳,更需要通过适宜且稳定的互动方式实现情感满足。但流动时代,人的情感交往物质场域、情感关系对象、情感活动内容及表达方式等,均被赋予了不稳定性。

具体于青年“留守宝妈”而言,随着乡村社会各类“物”的流动性变化,她们除了形体会被经常放置在相对陌生的交往场域——乡村发展形态现代化转向与物质活动场域“新一旧”“虚一实”分化整合、“熟人”经常抽离与关系对象不停变化(如“生人社交”)、传统人情观解构与重构等,精神也会跟着形体一起进入到一个个相对陌生的空间。这种“熟悉”与“陌生”间的情感交往场域频繁性无序之变,与弱观照、高压力的现实体验在精神世界相向而行时,渴望情感满足与延时情感满足的矛盾便会愈加激烈。随着乡村社会加速转型,这种现实性情感矛盾的影响性会持续增强,进而为青年“留守宝妈”情感生活质量提升制造出无形“隔离带”。概言之,乡村现代化转型中交往实践场域的极速变迁所引发的熟悉情感场域与情感内容的极速更新,其与高压化的抚养性劳动、不确定性的情感需求等相碰撞,会促使青年“留守宝妈”情感满足期相对延长。XCJ—33—07在访谈中说:“农村发展真的很快,一年一个样,老家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都有很大变化,有时会觉得不适应,小时候的那种感觉没有了。现在的农村人和城里人差不多,功利心都挺重的,过去那种‘热心肠’都快没了,和一些人相处感觉没以前那么亲。”受访者JFF—24—06、ZM—25—14和CL—27—02等也有类似体验感,如ZM—

25—14谈到,“农村生活条件改变很大,但总感觉生活氛围没有以前那么纯粹、和谐,和婆家这边人确实也交流不来。现在的农村生活也挺压抑”。

三、流动时代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情感价值维度

情境影响着人的情感,情感也以“整全性回应”影响着人与情境的“交互整体”。回应流动时代青年“留守宝妈”情感价值,不仅关涉为何要剖析与化解“留守宝妈”情感困境,更是对农村青年、妇女及儿童事业的应有重视。家庭与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2]。流动时代下,青年宝妈的留守与融入,既为孩子提供了一个较温馨的成长环境、为农村“大家庭”发展与关系维护提供了一定的劳力和情感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情感是人精神生活的最重要的组成,可作为人类生存的适应机制、认识发生的动力机制、行为选择的评价机制、生命的享用机制等,并借以影响社会发展整体质量^[33]。于农村青年“留守宝妈”而言,其情感价值维度更加具体、内在逻辑更为显著,覆盖个人身心、子女培育及家庭生产、群体进步与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

1. 情感具有内在感染性,可在多维度流动情境中维护“宝妈”心理健康

青年成长中存在的现实局限性,不仅体现在社会实践层面,更体现在心理活动层面,如容易从理想状态理解世界^[19],心理活动易受外界影响。而情感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重要性,是一切思维发生与经验重组的前提和驱动力^[23],健康向上的情感能有效感染个体并有序调节心理活动——情感对个人发展的“整全性回应”包含着对整个心理活动尤其是思维认知与心理情绪的感染性调节。杜威指出,“情感是已实际发生的或即将出现的突变的意识符号。不协调是机遇,它会导致反思”^[34]。具体于流动时代农村青年“留守宝妈”而言,面对互动性“重要他人”频繁化的时空性流动、新旧文化价值理念间的动态化冲突、数字化负向信息的极速化传播与渗透,以及交往实践场域与情感内容无序之变等给其心理活动带来的现实张力,作为个体心理重要组成的情感,能够有效感染其自觉应对“流动之变”,巩固个人在流动化情境中维护和促进个体心理健康的主体性,防止其作为自我的整全性被流动性因素所分解。例如,对“重要他人”的亲密情感,能有效感染其积极构建、维护与“重要他人”跨时空和谐人际关系,拉近心理距离;对乡村传统文化的热烈情感,能有效感染其理性认知城乡文化价值理念间的差异性,在冲突中端正心态;对主流价值的情感认同,能有效感染其自觉摆脱数智时空中泛在的负向性数据信息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干扰,等等。

2. 情感具有精神渗透性,可在高强度劳动实践中增强“宝妈”育儿信念

情感与人精神系统其他要素紧密相联,如责任感、意志等,具有强烈的内在渗透性,在某些情境下甚至直接支配其他要素功能发挥,如在亲子关系构建中。情感实时影响个人行为实践,没有健康的心理情感,人的各项事业发展将失去前进动力。而根据相关研究,焦虑情绪也会使人生理上出现易疲劳、肌肉紧张,认知方面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等症状,影响实践活动质量^①。杜威情感理论视界中,来自社会实践、伴随个人行为的情感,始终具有明确对象,并内含指向对象的态度,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验的源头——情感可转化为经验。青年“留守宝妈”始终是“现实中的个人”^[35]、从事物质生产和家庭再生产的个人,也是人与特殊情境交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动态变化的“有机整体”。在交互性“重要他人”频繁抽离、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急速转型、焦虑性数字信息日常性渗透等情境下,新晋青年“留守宝妈”持续处于子女抚养、角色转换和环境适应等压力之下,正向情感需求很高——需要积极的情感及时融入、激发和驱动,如真诚关怀、激情、责任感等,以使她们在子女抚养、家庭生产、乡村治理参与上更具信心、更有活力。受访宝妈均表示,感到心情愉悦或被亲朋赞美、关爱时,她们在抚养子女过程中所产生的疲乏感、紧张感就会相对减少,并能更自信地从事既定或额外照顾大家庭的劳动实践。

① 资料来源于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针对防疫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心理调适建议,<http://csp.cma.org.cn//NewsDetail.aspx?id=3824&.Hidden=0>.

3. 情感具有群体交互性,可在群体间动态交流中促进“宝妈”协同进步

青年“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35],对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来说亦如此,尽管其当前活动圈子较窄。杜威强调,“同情”性情感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彼此间的团结^[36]。情感既依附于交互过程,也作用于交互过程,具有强烈交互性——个人情感可以在交互中影响别人,使其产生强烈的内心体验,并形成与之相应的情感。这种情感交互性及其衍生出的“黏合的力量”,在一个关系紧密的群体内部会表现得更强烈,且其主要是借助情感的现实表征——情绪来即时实现。情绪是人适应环境的基本机制,蕴含与直接反映着主体精神能量与欲望,连接各主体情感维度交互、共生关系。在当下快节奏的生产生活场景中,情绪在群体内部高速流动,正增强着情感的交互性。而与男性相比,女性情感则具有情绪更丰富、外显性较强烈、带有更强扩散性和感染性等特点^[37]。流动时代下,独自留守农村的青年宝妈由于正处青年期和母亲身份适应期,且面临不同程度的由“半工半耕”家计分工模式带来的生产生活压力和人际冲突,如日常性家庭劳务与农业生产压力、婆媳间的人际冲突等,她们会时常通过“抱团取暖”方式进行群体间的动态化交流。在此过程中,健康情感的内部扩散性和交互性,能有效驱动她们更密切地进行相互关照、彼此影响精神世界有序塑造,实现群体内部成员协同进步。

4. 情感具有实践扩展性,可在乡村社会急速转型中缓和人际矛盾冲突

随着社会流动加快,乡村社会转型与利益关系调整也在加快,由此导致乡村社会人际矛盾与冲突频发。而包括情感交往在内的精神交往,就像社会的经络,贯穿于社会关系中^[38]。情感与人及社会本质相联系,“以其比逻辑—理智先在的地位,以其作为动力系统的优势,打开了通往价值理性的道路”^[33],影响社会关系构建。情感在社会交往中的价值,从整体上看就在于:人的情感包含可反思空间与“黏合力量”,积极向上的情感能够让人自觉地将事物间的矛盾维持在“统一/共存”状态——真诚、同情、恭敬等,都会让各交往主体间的心灵更贴近。杜威明确提出,社会性的“共情”可以在社会实践中转化为有建设性的力量^[36]。情感是理解乡土的关键词,流动时代下,乡村社会急速转型带来的矛盾具有情感交往上的特殊性——通常涉及内含不同程度情感的“熟人关系”。促进青年“留守宝妈”情感健康,一方面能使其更理性地应对发生在身边的人际矛盾,如代际矛盾、邻里矛盾等,主动消除摩擦,助力乡村和谐社会建构;另一方面,利于她们通过所接触的交往对象,将积极情感传递给更多圈内好友,为公众情感交往增添理性,增加整个社会和谐度。情感还具有道德感、理智感、美感等更高级形式^[37],由此决定“留守宝妈”健康情感的积极培育,也有助于乡村现代化转型中形成新的“交互整体”,推动和美乡村建设深入群众心灵,获得更普遍的情感认同。

四、流动时代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情感观照理路

情感作为“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5],它的生理基础不可选择,“但情感的培育和控制却是后天才有的,可以按照人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37]。在各类流动性因素驱动青年“留守宝妈”情感问题持续叠加化、复杂化的流动时代,应切实立足她们情感发展现实样态与乡村生产生活具体实际,通过情感交往管理方式的优化、和谐人际交互情境的创造、基层群团组织情感关照与服务能力的增强、关联性制度机制的完善,以及充分激发个人情感素养培育自主性等,系统化观照其情感世界全面发展需求。

1. 优化乡村社会情感管理方式,常态化助力“留守宝妈”减少情感劳动压力

情感交往方式科学化程度同个人情感劳动量联系紧密。为合理降低社会性流动给青年“留守宝妈”带来的高情感劳动量,在乡村服务治理中应重视情感管理,通过人际交往管理方式持续优化及向情感领域合理渗透,打造好有人情温度的和美乡村。情感管理,就是以人的情感为管理核心,通过影响人的情感构成要素、交往交流方式,调动人的正面积极情绪,强化人“为人处世”能力,进而达到推动所在团体实现发展的目的。面对极具人情交往敏感性的青年“留守宝妈”,乡村社会管理者应通过有效的情感管理,全面提高对她们的情感观照度,助其有效摆脱流动情境中高压化的情感劳动困境。

第一,基于青年“留守宝妈”情感内容丰富性和情感需求强烈性,乡村社会管理者应自觉摆脱传统负压式管理、沟通模式,在明确任务目标的同时,兼顾对象内在情感诉求,强化情感上的柔性管理,并将其合理纳入精神文明治理范畴。一方面,深入青年“留守宝妈”群体展开调查研究,在精准了解她们现实情感特征基础上,在乡村日常管理中合理搭建平等对话平台,丰富友好的情感沟通情境,赋予其更多情感交往话语权。另一方面,及时根据乡村社会整体情感需要,深挖当地情感资源,优化内部管理模式,积极构建立足本村实际的柔性化情感管理体系,旨在通过有情的管理办法减少“留守宝妈”情感交往压力的同时,有效激发其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同邻里交往的热情和激情。第二,基于农村熟人社会特点,进一步强化服务管理者自身共情、移情能力,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合理提升基层群众情感智力和情感行为能力,让广大群众尤其是深受熟人社会旧有交往理念影响的老人群体,都能自觉建立与“留守宝妈”的良好情感互动渠道,彼此熟知内在情感倾向和实际需要,形成协同式情感管理服务模式,使“留守宝妈”持续处在和谐乡村“情感共同体”中。

2. 创造升级健康人际交互情境,系统化助力“留守宝妈”消解情感互动冲突

作为社会性情感人,我们始终生存于蕴含一定情感性的人际交互情境中,被无形的情感生态所影响。人际交互情境,是指特定时空对主体人际交互产生影响的诸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与过程构成的境况,其中语言要素对其产生的影响最为日常和直接。流动时代下,习得一定城市生活理念和习惯的青年宝妈回村留守后,一些“熟人”会日益减少对她们的情感观照,对其不符合传统要求的育儿理念、生活习惯、待客方式等,会用“口耳相传”方式进行负向评价,出现冲突性交互情境,刺激“宝妈”内在情感世界。应注重为青年“留守宝妈”创造升级健康人际沟通情境,助其有效消解流动带来的情感互动冲突。

其一,通过网格化管理、精细化引导等,有效加强言语监督、净化乡村舆论环境,坚决抵制对“留守宝妈”进行恶意造谣、贬低的违法失德行为,优化主体间情感的结构性互动。有序推动由文化价值理念间的冲突带来的“批评话语”“牢骚话语”等,合理转为真诚观照、悉心指导的温情行为,使“留守宝妈”情感上的日常化“消极输入”能在互敬互让中化为“互动式释放”。其二,合理加强对农村女性特别是青年宝妈价值的打造与宣传力度,有效澄清和纠正公众对农村宝妈的认知偏差,提高她们社会地位、扩展她们价值空间,以让其能更自豪地在乡村同熟人进行情感沟通和关系构建,参与乡村情感关系再生产。其三,基于先进文化的凝聚、导向功能,结合乡土地缘性、群众趣缘性,科学构建乡村先进文化网络,深挖和培育好与青年宝妈相关的精神文化、价值理念,使其渗透到家家户户,营造出利于“留守宝妈”获得情感发展的良好交往情境。其四,也应积极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使乡村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能及时触碰和内化城市先进文化,进而有效减少由价值观念、文化差异等带来的同青年宝妈的交往冲突,提升情感交互适配度与和谐度。

3. 强化群团组织服务能力建设,日常性助力“留守宝妈”摆脱内在情绪焦虑

数智媒介普及化应用,使得各类焦虑性信息能更便捷、迅速地向农村地区流动,致使青年“留守宝妈”频繁陷入数字化焦虑情境。群团组织是我们党联系特定社会群体的重要纽带,其中,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力量,要把工作延伸到广大青年最需要的地方去,千方百计为青年排忧解难^[19]。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重要桥梁,要多做化解矛盾、增进感情的工作,格外关心贫困与留守妇女^[39]。群团组织开展的关怀行动,对组织服务对象情感抒发、情绪宣泄及情感关系构建具有重要促进作用。鉴于流动时代各类焦虑性信息借助数字途径时常环绕在青年“留守宝妈”身旁,且这一趋势难以一时改变,乡村群团组织应主动瞄准与剖析其情感发展的特殊诉求,通过情感教育、开展活动、提供帮助等,对她们进行心理情感上的服务与疏导,助其摆脱焦虑情绪。

首先,通过建立与完善定期联系和帮扶机制,促使基层群团干部自觉走近青年“留守宝妈”,与她们定期进行交心谈心,倾听与感悟她们的情感困惑,明确她们的情感需要,进而借以科学规划今后工作的重点方向、内容与方法,不再让其游离于群团组织服务与团结之外。其次,鉴于有益性文娱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情感释放性,群团组织应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各种资源与条件,多维度整合既有情感交互场域与情感资源,多元化开展观照青年“留守宝妈”情感需求、切合她们生产生活实际的活动,如情

困惑感交流会、育儿家务大比拼、“小农电商”培训班等,使其在活动中得到压力释放、构建内在健康情感空间的同时,相关生产生活技能也能实现同步提升。最后,合理利用各自组织优势,定期组织相关专家、学者或有着心理学科背景的青年志愿者走进乡村,在开展好心理知识宣讲的同时,对持续处于情感高压之下的青年“留守宝妈”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助其定期疏通情感、发泄情绪、调适心理,正确认识传统情感交往,同时摆脱对数智空间的情感依赖,有效累积健康情感。

4. 构建科学融入性制度机制,有序性拓展“留守宝妈”情感需求满足通道

社会急速转型背景下,非科学的隐性潜规则、老规矩、旧机制的存在,是造成部分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情感问题积压的重要因素,如传统人情交往习俗、社会管理方式等。应系统构建可有效平衡乡村发展转型需要与群众和谐情感交往需求间现实关系的制度机制,合理打破老规矩、旧机制等对“留守宝妈”心理情感满足上的束缚。换言之,相关制度机制构建应合理立足城乡发展多元需要与个人发展实际需求相协调的隐性“心理契约”(个人将有所奉献与组织有所获取之间,以及组织针对个人期望收获而有所提供的一种配合^[40])之上,相对缩短青年“留守宝妈”精神舒缓通道,助其及时、有序地获得相应情感满足。

一方面,立足城乡融合发展逻辑,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机制束缚,助力青年“留守宝妈”有效维护与增进同核心层交互性“重要他人”现实情感联系。流动时代,城乡“二元”发展机制是迫使青年宝妈留守乡村的主要因素。应持续优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切实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优化农村产业发展结构,让广大“留守青年”能享受到与城市同等或较好的公共服务、发展空间,进而影响更多青年夫妻在乡村创新创业、寻求发展,共同承担“养育”与“敬老”双重责任。另一方面,于乡村人情社会具体运行机制而言,各责任主体应坚持践行好本地“心理契约”,及时完善各项具体的、可支持“留守宝妈”情感发展的人际交往机制。第一,立足当地人情社会日常运行实践,加强针对性调查研究,有效健全具有较强针对性和现实观照性的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制度。第二,有效把握与提升制度执行人本性与实效力,有序升级乡村情感实践公共空间,为“留守宝妈”创造更多情感交往上自我赋权的社会情境,使其更具归属感。此外,也应充分发挥数智优势,因时应势完善数智化人际沟通机制,为“留守宝妈”搭建好可跨时空的情感交流平台,实现情感满足及时化。

5. 自觉提升情感智力水平,强化自身在复杂流动情境中支配情感实践主体性

情感智力包含准确觉察、理解、评价和表达情绪的能力,接近并产生情感以促进思维的能力,以及调节情绪以促进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力等^[37]。人类情感世界发展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情感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新实践参与而不断分化、增多,情感内在层次结构因新理念摄入而不断复杂、多元,情感现实功能因新技术介入而不断演化、加强等。鉴于情感在身心健康、工作效率、人际关系构建等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日常情感劳动量极大的农村青年“留守宝妈”应善于自我提升情感素养——切实提高情感认知水平、有意体验健康情感内容、合理疏导情感情绪逆流等,持续强化情感社交主体性。

首先,自觉通过专业知识摄入,提升自身情感世界认知能力。只有深入了解情感,才能更好地控制和装饰内心情感。“留守宝妈”应善于利用空闲时间学习一些与情感相关的专业知识,并在情感交流实践中运用所学进行自我剖析,以提升情感认知力、感受力。其次,积极通过健康文娱活动参与,丰富自身情感生活内容。内容积极的文娱活动,能为正向情感输入创造条件。“留守宝妈”应合理利用线上线下各类平台,主动参与有益文娱活动,并在活动中尽情释放情感压力、输入愉悦情感,以让内在情感世界更富有。再次,主动请专业人士帮助,找到疑难情感问题科学处理方式。正确处理情感问题,是拥有健康情感生活前提。面对自己一时间无法有效化解的情感问题,“留守宝妈”应结合自身情感实际,积极求助专业人士,在他们的帮助下合理解决难题、完善自身心性。最后,合理通过日常实践演练,提升自身情绪控制能力。能自主控制个人情绪走向,是成为情感世界主人的现实基础。“留守宝妈”应在个人日常交往实践中有意调整和控制自我情绪,或有意参与有经验的前辈情感活动实践,通过有益经验汲取和情绪调控演练,来提升个人情绪的整体控制力。

五、结语

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重要力量。而人始终是情感性存在,青年女性更是如此。为充分发挥流动时代下青年“留守宝妈”在家庭再生产、乡村振兴与儿童事业发展中的主体性、创造性,须有效关注她们的情感发展。在马克思青年观与杜威情感理论观照下,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发现,流动时代下,“重要他人”频繁化的时空性流动、新旧文化价值理念间的动态化冲突、数字化负向信息多模态传播与渗透、乡村社会转型中交往实践场域与情感内容无序之变等,为农村青年“留守宝妈”情感生活营造出特殊的流动性情境,使其情感劳动量持续增加、日常情感输入消极化、时常陷入焦虑情绪及情感需求难以合理满足。

在长时间、多维度、复杂化的流动情境中,内蕴心理感染性、精神渗透性、群体交互性、实践扩展性的健康情感,对青年“留守宝妈”来说,具有维护个体心理健康、增强自身育儿信念、促进群体协同进步、缓和乡村人际矛盾等多维价值。应有效形成党政部门主导、地方机构主抓、社交媒体烘托、基层组织重视、群众有序参与、自我有意提升的情感关照格局与机制,从升级基层社会情感管理方式、构建更和谐人际沟通情境、强化群团组织服务力建设、持续优化相关科学制度机制,以及引导宝妈自觉提升情感智力等方面,系统化助力青年“留守宝妈”化解相应情感困境,有序塑造健康情感世界,更好实现现阶段自我价值。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带着真心真情付出更大努力 为推动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N].人民日报,2023-09-29(1).
- [2] 人民日报社.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N].人民日报,2022-03-07(1).
- [3] 程梦瑶,段成荣.迁徙中国形态得到进一步确认[J].人口研究,2021(3):75-81.
- [4]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5] 周皓.我国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及其演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85-201,206.
- [6] 张静抒.情感管理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 [7] 高迎爽.当代大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状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8] 朱小蔓.重视对情感能力的培养[J].上海教育科研,1993(3):20-21.
- [9] SEWELL W H, HAUSER R M, SPRIBGER K W, et al. As we age: a review of the 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 1957-2001[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04(20):3-111.
- [10] 董宏鹰.论情感劳动异化的三重维度[J].中州学刊,2014(8):130-134.
- [11] 叶文振,奂倩.劳动空间、青年女性与情感的生产和消费[J].中国青年研究,2019(2):5-13.
- [12] 陶志欢.青年“群体性孤独”现象的审思与调适[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5):88-96.
- [13] 吕芳.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构成研究——基于16省66县2414名留守妇女的调查[J].妇女研究论丛,2012(5):36-42,47.
- [14] 陈志霞,冯慧春.女大学生情感能力教育的实践与思考[J].教育探索,2014(2):129-132.
- [15] 端木燕萍,章荣君.情感嵌入:智慧治理背景下返乡青年嵌入乡村治理的新路径[J].领导科学,2023(3):84-88.
- [16] 刘汶蓉,李冰洁.“过家人难”:农村青年的婚姻风险化与个体策略困境——基于豫西南D县的调查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21(2):84-96.
- [17] 张倩.乡村青年媒介化圈层社交的转型与“情感团结”再造——基于晋东南J村的民族志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4(9):39-48,56.
-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20] DEWEY J. The early works(Vol.4)[M].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1.
- [21] DEWEY J. The early works(Vol.2)[M].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7.
- [22] DEWEY J. The later works(Vol.10)[M].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3] ALEXANDER T. John Dewey's theory of art, experience and nature: the horizons of feeling[M].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7.
- [24] DEWEY J. The later works(Vol.13)[M].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5] HOCHSCHILD A R. Emotion work, feeling rules, and social structur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9(3): 551-575.

- [26] KIM H J. Hotel service providers' emotional labor: the antecedent and effects on burnou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8(2):151-161.
- [27] 朱浩.情感治理的场景实践与新型乡村共同体的构建——基于S市农村睦邻场景的类型化分析[J].探索,2024(3):77-94.
- [2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9] 殷乐,杨默涵.数字媒介生态下的情感传播:生成机制、关系性逻辑与行为实践[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6):27-34.
- [30] 徐明华.情感传播:理论溯源与中国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31] 肖平,周明星.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110-117.
- [3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3] 朱小蔓.情感教育论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34] 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3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6] 杜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9卷[M].俞吾金,孔慧,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37] 舒培丽,胡近.女性与情感[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38]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39] 新华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组织动员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建功立业[N].人民日报,2018-11-03(1).
- [40] 施恩.职业的有效管理[M].仇海清,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

The Emotional Predicaments of Rural “Left-behind Young Mothers” in the Era of Mobility and Paths to Their Empowerment

HU Deqing

Abstract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emotional issues of rural youth and young women seldom addresses the group of rural “left-behind young mothers (宝妈, bǎomā)”, who are in dire need of emotional support in this era of mobility. Drawing on Marxist perspectives on youth and Dewey’s theory of emotion, this study employs a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observations alongsid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left-behind mothers” in the era of mobilit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frequent spatiotemporal mobility of “significant others” intensifies the emotional labor burden of these mothers. Dynamic conflict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cultural values contribute to a negative emotional input in their daily lives. The multimodal dissemination and infiltration of negative digital information frequently plunge them into emotional anxiety. Furthermore, the disorderly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practices and emotional content during rural societal transitions makes it challenging for these mothers to have their emotional needs adequately met. Healthy emotions possess intrinsic qualities of positive internal contagion, mental permeation, group interactivity, and practical expansiveness. These qualities can safeguar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left-behind mothers”, bolster their parenting confidence, foster their collaborative advancement, and mitigate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within rural communities, even amidst multidimensional and high-intensity mobility contexts. To address the emotional challenges faced by rural “left-behind mothers” in the era of mobility and to help them cultivate a healthy emotional world, it is essential to upgrade grassroots emotional management approaches, create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s, enhance the service capabilities of mass organizations, optimize relevant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improve their self-emotional care abilities.

Key words era of mobility; rural youth; “left-behind young mothers”; emotional life; left-behind women

(责任编辑:余婷婷)